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沉浮与回归

为什么是凯恩斯？

「英彼得·克拉克◎著 陈洁 宁振业◎译

The Rise, Fall, and Return of the
20th Century'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THE
RISE, FALL, AND RETURN OF THE
20TH CENTURY'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KEYNES

the Rise, Fall, and Return of the
20th Century'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为什么是 凯恩斯？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浮沉与回归

「英」彼得·克拉克◎著
陈洁 宁振业◎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什么是凯恩斯? :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沉浮与回归 / (英) 克拉克著; 陈洁, 宁振业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080-6488-8

I. ①为… II. ①克…②陈…③宁… III. ①凯恩斯, J. M. (1883~1946) - 经济思想-研究 IV. ①F091.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82445号

Keynes: The Rise, Fall, and Return of the 20th Century'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Copyright © 2009 by Peter Clark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6987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30 1/16开

装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印张: 14

版次: 2011年6月北京第1版

字数: 160千字

201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言

大起大落的声誉

如果世界再一次陷入萧条将会怎样？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经济不景气，但这种说法简直是荒唐可笑。而“技术性衰退”的说辞也是摇摆不定，甚至“信用紧缩”这一精彩评述也不足以解释这轮经济下滑。“经济衰退”已接连被各个主要经济体的官方所承认——意味着至少连续两季的衰退。我们从经济学家、企业领袖和政治人物口中熟悉了这个字眼，他们认为这看上去是“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经济衰退。然而，若这场衰退果真与上次规模一样巨大，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能做什么？又究竟如何看待？

让我们看看上世纪的情形。如果无从下手，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关注上世纪的萧条——失业率飙升，风雨飘摇。不论是经济学家对形势的讨论，抑或是英美各类报刊媒体的评论，有一个名字总会跃入耳畔。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突然结束了全球大萧条，在此背景下，我们总能看到活跃其间的那位高大驼背的男子，他面容苍白，双眼有神，头发稀疏，胡须浓密，令人既熟悉又陌生。他，就是凯恩斯。凯恩斯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什么他的思想在当下对我们而言是这般重要？

凯恩斯声名显赫。在过去的90年间，人们颂扬他、蔑视他、尊重他、借用他、嘲笑他、崇敬他、贬损他、重新发现他，但却很少忽视过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声名鹊起，引起大西洋两岸公众的注意始于1920年。那一年，正值而立之年的他已然闻名于世，与其说因为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不如说因为他在1919年圣诞前夕出版的那部名为《和平的经济后果》的著作，书中对《凡尔赛和约》的不足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真知灼见。他的描述带着亲历者的直观和权威的超然态度，言之凿凿，令人信服。对战败的德国要求天价赔偿的问题上，英国战时首相劳合·乔治是否以威尔士的狡狴“哄骗了”正直的长老教会信徒、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凯恩斯用戏剧化的手法描述了主要事件，从而赋予这些重要人物以活力。在指责追悔莫及的劳合·乔治未对被蒙蔽的伍德罗·威尔逊坦诚相告时，他希望“不哄骗”读者，而是呈现这些事件背后的真相。

《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简洁易懂，一经出版迅速风行各国。到1920年4月，仅在英国就已经售出18 500册。对于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凯恩斯而言，这的确算是成绩斐然。而在1919年“巴黎和谈”上，身为劳合·乔治的财政顾问之一，凯恩斯作为谈判桌上名不见经传的配角，才刚开始出现在伦敦的非主流报纸上。1919年5月27日，凯恩斯以他本人从未使用过的名字——约翰·M.凯恩斯——第一次登上《纽约时报》。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和平的经济后果》的美国版便售出70 000册。《纽约时报》对这本毁誉参半的著作给出整版评论：“在英语国家中，这部作品足以带来严重损害，让本已混沌不堪的时代蒙上更为沉重的阴霾。”¹

凯恩斯的“损害力”远非如此，这才不过是开始。他大张旗鼓地登上世界历史舞台，随时准备果敢应对唏嘘和敌意，他将继续留在聚光灯下，而且不只是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泰晤士报》的60篇报道及评论提到了他；20世纪30年代这一数字接近100。相比之下，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他的名字在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时报》上出现了近300次——美国人对这个频繁被提及的男人表现出了密切的关注。因此，20世纪20年代晚期，当《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作者用他活跃的思想和犀利的笔触论及失业问题的时候，他俨然已经拥有了在世界范围内施展的平台和受众。

20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来袭前，英国工业体系发展停滞，其境况无法与美国富有活力的经济相提并论，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了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前。身为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自然关注国内经济的不景气。保守党认为保护主义能够提供富有希望的解决方案，尤其认为关税能将大英帝国紧密团结在一起。凯恩斯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对此持反对意见，但与此同时，对单纯依赖市场力量达到目标的正统观念也持不同观点。相反，凯恩斯大胆参与公开辩论，认为应该对失业问题采取严厉的应对措施。

耐人寻味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凯恩斯支持的政治人物并非他人，恰恰是劳合·乔治。正如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所言，1918年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将其宣传为“赢得战争的人”，却在1919年变成了“失去和平的人”。劳合·乔治如今想重整旗鼓，希望回到重新联合的自由党，而凯恩斯当时也恰恰在党内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凯恩斯不可避免地被问及颇为尴尬的问

题：“自1918年以来，您对劳合·乔治品性的看法改变了吗？”凯恩斯温文尔雅地答道：“我和其他人的不同在于我因劳合·乔治的错误反对他，因劳合·乔治的正确拥护他。”²在随后的许多场合中，他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行为不止一次遭到质疑。当面对不同的事实和更合理的论点时，他总是會改变自己的想法，并从不为此道歉。

标新立异的凯恩斯当时大声疾呼：当经济状况表现不佳，应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凯恩斯首次提出个人的经济纲领，而它时至今日仍饱受争议。他将当时的主流体系称之为“个人主义和放任主义”，并大加批驳。他认为“放任主义”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如今它却表现出对市场的迷信和盲从，原本作为手段的市场，却成了目的本身。可是，当时的现实急需借助实验性手段来促进经济复苏。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英国，放任主义的正统学说认为，从长期来看，要依靠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的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才能渡过难关。

凯恩斯却对此持否定态度，并说出了他最著名的一句话：“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³正是这句话使他无法被人遗忘。反对者总是对此抓住不放，反复提及他对所谓“短期”的执著。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曾在一次保守党大会上评价道：“任何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连一棵树都种不了。”⁴源自凯恩斯的权宜之策使几代人承受了违反市场规律的无情代价，为此，他备受指摘。

这些争论随着1925年英国决定恢复金本位制而陷入危机。当时负责制定经济推动政策的是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他对财政一窍不通，但却积极参与讨论，恭听他人意见，努力从技术性论证中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良策。在聆听了凯恩斯的建议之后，他却以婉转之由将

之束之高阁，最终回归金本位制。这意味着英镑将紧盯着4.86美元的汇率。对丘吉尔来说，这便意味着必须面对现实。在凯恩斯看来，这不仅十分不切实际，而且完全可以避免，正如他广受争议的单行本的标题所暗指的，这完全是“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

作为备受争议的人物，凯恩斯一直深陷各种论战。他倡导英国进行公共工程建设，并以此在1929年公开支持劳合·乔治的竞选，但这一主张并未获得青睐。可是，就在同年晚些时候，当经济大萧条席卷美国，人们再也无法忽视他的观点了。由此，他再次抓住契机，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大量建议。虽然他坚持不懈，但财政部又一次拒绝采纳他的建议。凯恩斯最亲密的合作者、自由党经济学家休伯特·亨德森在这个关键时刻，也转而站在他的对立面，指责凯恩斯低估了预算困难，并无情地嘲讽道：“我认为如果你执意忽视后一问题，认为资本支出便能奏效的话，那么你已经陷入危险处境。你可能因说服英国人自我毁灭，在一个比你以往粉碎了的更加巨大的幻觉上下赌注，而被写入历史。”⁵

凯恩斯对此无动于衷。在评论家眼中，他甚至越发变本加厉，时刻准备提出各种质疑，去对抗金本位制和平衡预算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自由贸易这个昔日美好的自由党信条。凯恩斯提出很多行动方案，其中既不乏睿智，亦存在矛盾。对此，一些政府官员曾经说过：“如果有六种相互冲突的意见，那么其中两种就是凯恩斯提出来的！”⁶无论是1929年开始执政的工党少数派政府，还是之后在1931年的危机中取而代之，由保守党主导的国民内阁，凯恩斯高明的想法都没有引起其财政部的兴趣。原来担任财政大臣、而后成为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本人就是采纳凯恩斯经济纲领的明显阻碍。

这场“经济风暴”恰如字眼本身贴切的形容，迫使英国在1931年放弃了金本位制，并在随后的大选中使工党和自由党一败涂地。凯恩斯因此失去了最默契的潜在政治盟友。素以机智言论损友的凯恩斯，这次又发表了一段他审慎地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删除的文字，结果与劳合·乔治反目成仇。于是劳合·乔治在他的那部畅销作品《战争回忆录》中反唇相讥，称凯恩斯是个“富有娱乐价值的经济学家，他针对财政和政治经济发表的机敏而粗浅的论述，如果不要太当真的话，倒可供读者娱乐一番”。⁷当凯恩斯颇有名望的曾经的支持者都给出此番评价的时候，显然他在英国的政治信誉在1933年年底恰如国际经济形势一般，再无法豪气冲天，已然走高无望了。

* * *

“不要说斗争是徒劳无益，”一位诗人^{*}这样写道，并在结尾给我们以安慰，“但，向西看，那方土地阳光普照。”这是个重要时刻，新任总统在华盛顿就职。这也是个充满希望的时刻，一个需要大胆创新的时代。在总统就职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人们无法确定毫无经验的民主党政府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们更无法确定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否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人们对总统倾注了莫大的期望，也希望他能给焦急万分、急需获得安慰的民众说明政策的实质内容。他所面对的不仅是

* 译者注：指英国诗人亚瑟·休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 1819—1861）的诗作“不要说斗争是徒劳无益”（Say not the struggle naught availeth），结尾句为But westward, look! The land is bright（但，向西看，那方土地阳光普照）。

美国民众，全世界深陷经济大萧条的人们也在翘首以待。

形势随即变得明朗起来，富兰克林·D.罗斯福选择了积极主动的方案，即使这意味着中断1933年夏天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在宣布美国放弃金本位制之后，罗斯福总统果断地摈弃了“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所谓灵丹妙药”，这的确让那些想要恢复旧制度的人惊骇不已。

“美国总统昨天大胆切开了蜘蛛网，这样的做法已经久所未闻了。”凯恩斯立即发表文章，此文被各家报纸广泛刊登，他认为罗斯福“在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政策之间，漂亮果断地作出了正确的决策”。⁸

凯恩斯的名字和新政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在《纽约时报》上，他的名字在20世纪30年代被提到近400次，20世纪40年代被提到近500次。对于他的报道并非总是溢美之词，亦有意识形态反对者指责他是所谓施行社会主义实验的邪恶天才。凯恩斯在一封写给总统的公开信中作出了回应，这封信刊登在了1933年岁末的《纽约时报》上。他在信中说：“每个国家都想通过现存的社会体系进行理性的实验，以挽救这种糟糕的状况。而你便是这些人可以仰赖的对象。如果你失败了，世界范围内的理性变革都将遭受严重打击，正统派和革新派之间将会爆发战争。”⁹

奇怪的是，与本国的经济政策讨论相比，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思考不仅更接近核心，而且也比任何美国经济学家更切中要害。这倒不是因为美国大学缺乏知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也不是因为这些学者的资历逊于凯恩斯。事实恰恰相反。到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常简称为《通论》）时，和国际同行重量级的学术成果相比，他的成就实在显得单薄而寡少。关

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另作解释。

以与凯恩斯同年生的一位杰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为例，他以影响深远的“创造性破坏”概念而著称，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得以自我更新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熊彼特执教于哈佛大学，但他的学生似乎对遥远的剑桥大学教授凯恩斯对理论的深刻见解更感兴趣。

《通论》的一个影响是，它的出版众所瞩目，不只是在剑桥，甚至连哈佛大学熊彼特的弟子也加入了争相购买的行列。熊彼特称《通论》是“为一项明确政策的辩护。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分析者的影响，试图构架他的假设，掌控他的思想”。¹⁰

这对于充满渴望的学生无法构成任何障碍，他们对令人振奋的新学说如饥似渴。年轻的哈佛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斯后来评述道：

“如同《圣经》和马克思，晦涩引发抽象的辩论。”¹¹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1939年的那幕悲惨情景。当时熊彼特出版了他的两卷本学术著作《商业循环》，长达1 095页。在哈佛大学，他本人忠诚的学生们组织了针对此书的特别研讨会，但结果却说明他们或许不够忠诚。当研讨会开始时，一个可怕的事实是没有人读过《商业循环》；更糟的是，他们却都读过《通论》；最为糟糕的是，整个讨论会大家都在谈论凯恩斯，而非熊彼特。

的确，凯恩斯的思想广受欢迎，我们需要加以了解的是与外在环境有关的一部分，而这个环境必然会将布卢姆斯伯里囊括其中。布卢姆斯伯里是伦敦的一个区，已成为文化环境的代名词，而凯恩斯当时便活跃其中。众所周知，他一生和利顿·斯特雷奇过从甚密。利顿·斯特雷奇于1918年完成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这

一打破传统的作品如暴风雨般震撼了整个文坛。当然，凯恩斯和斯特雷奇的关系到后来才为人所知。此外，他的朋友还有两位著名的小说家：E.M.福斯特和弗吉尼亚·吴尔夫。凯恩斯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关系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的文字影响力反映出他的作家禀赋，这一点我们还将讨论。

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英国处在内维尔·张伯伦的政治统治中，这对凯恩斯来说不能算作好消息。然而，这位剑桥经济学家的事业发展轨迹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尤其是1940年的夏季危机，当时，英国在温斯顿·丘吉尔的领导下，被推向关乎国家存亡的战斗中。

此时，凯恩斯终于可以运用他的影响力为战争提供支持。突然间，他不再只是个学者（不论多么有名），而是位居英国财政部最高层的决策者。若是问及他的工作内容，唯一的回答是他“只需要扮演凯恩斯就可以了”。他拥有独一无二的声望：于1942年获封蒂尔顿凯恩斯勋爵；被赋予全权与美国人谈判，从而促使美国为英国战时花费提供资源支持——首先是通过《租借法案》使美国为英国提供大量战时援助；之后，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结束，凯恩斯通过协商，成功获取大量贷款用于促进英国经济流通，从而帮助英国顺利完成向和平状态的过渡。

正如凯恩斯一向承认的，美国人所作的承诺是慷慨的交易，但是并非零和游戏，也并不意味着英国之所得建立在美国之所失的基础上。容易让人不满的是，战争为美国经济带来了繁荣，并且人们通常盲目而不加区分地将此归功于凯恩斯的政策。当然，认为凯恩斯是想

将采纳他的策略而蓬勃发展的结果归功于自己，也未免太过离谱，但凯恩斯大可真诚地说，美国人不会因为自己的慷慨而贫困。

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正如18世纪末的亚当·史密斯的理想世界，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每个人因劳动分工而受益。开明的利己行为是凯恩斯思考国际政策的出发点。他的名字显然会和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该金融体系创立于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就是在这个体系下保持了长达25年的兴盛繁荣。

在英国，丘吉尔领导的战时联合政府致力于“高度而稳定的就业水平”。在接下来的战后岁月，凯恩斯的这一政策得到了两党的认同。部分原因是两党急于推卸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失业的责任。一旦失业问题因凯恩斯的政策迎刃而解，那么一切又是那么显而易见。这似乎是为了内维尔·张伯伦的无知而赔罪，一位保守党发言人曾这样解释道：“凯恩斯勋爵的绝大部分经济思想具体表现在他对局势深入透彻的分析，只是考虑欠周到而已。”不过，大家对这个具体化的过程如今已取得共识。“对此，身为保守党员的我，也表示赞同。”¹²一位工党发言人喜欢这样说，“凯恩斯勋爵的学说以及战时经验的影响，已经在英国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观念，通过充分发展计划经济，可以有效遏制失业问题。”¹³

凯恩斯一直积极参与政府事务，直到1946年4月，他的心脏无法承担经年的压力为止，而其实自1937年起，心脏问题已经使他成为半个病人。财政部一位凯恩斯的老对头——理查德·克拉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凯恩斯去世的可怕消息，就跟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一样，犹如失去至亲。”凯恩斯学术上的劲敌弗里德里克·冯·哈耶克写道：“他是

我所认识的人中真正的伟人，我对他深感钦佩。”在伦敦，具有半官方记录性质的《泰晤士报》则这样评述道：“我们恐怕要追溯到亚当·史密斯，才能找到具有同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¹⁴但这会持续下去吗？凯恩斯的个人魅力让人敬畏。当经济学理论的创造者带着最后的荣耀，长眠于西敏寺的时候，他的理论是否会迅速被人们所遗忘？

而事实与此恰恰相反。之后的20年间，《通论》被赋予了圣经般的权威地位。和《圣经》一样，它更多的是被引用而非阅读，并且被引用时也会出现矛盾，但迎合它的权威当时看起来是必需的。因此，不论是学术环境，还是公共论坛，言必称凯恩斯俨然成了主流经济讨论的规约。20世纪50年代，战后自由党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托尼·克罗斯兰在对大西洋两岸的一代自由派人士的演说中说：“凯恩斯的手段如今已经获得广泛的理解。我们没有理由担心政府会重新采纳新政的经验，以增加开支的方式走出衰退，令人沮丧不安的其实是在实施过程中采用错误的知识。”¹⁵

1951年，当罗伊·哈罗德出版了其老友传记的时候，凯恩斯的神话流传得可谓如火如荼。哈罗德认为这本书的撰写是向下一代描述这位经济学家与国际政治经济家的真实内在，但最终却发现写作过程限制重重。首先，在引用政府档案时，必须接受检查，相关要员会仔细审阅文稿，以免其中有任何内容对美国构成冒犯——毕竟，美国是英国冷战时期的盟友，也是在美元短缺的世界里英国可以指望的最后资源。哈罗德面临的另一个困境远比是否会对美国构成无礼讥讽或是解释一段极端的政治同情的历史来得更为极端：凯恩斯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是个个性错位的人——有什么比揭露这一隐秘更能激怒麦卡锡时

代的美国呢？

不能让凯恩斯年轻时的同性恋倾向玷污具有官方性质的传记。哈罗德日后写道：“我知道他许多同性恋倾向的细节，但我没有在书中公然谈论此事，因为那个时代这些内容是不合时宜的。但凡是对同性恋倾向有所了解的人，多能从书中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些重要的事实。”¹⁶ 哈罗德深知，他的作品对那些了解个中原委的少数人来说一目了然，但对于大西洋两岸的大多数读者而言，书中没有什么内容会令他们心神不宁。直到迈克尔·霍尔罗伊德率先笔伐，在他所撰写的关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宏大、直言的传记《利顿·斯特雷奇》（1967）第一卷中，凯恩斯人生的另一面才得以公之于众。

当时，思想和文化氛围对此更为容易接纳和宽容。英国当时所处的时代普遍在经济政策上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不只是政党间的意见一致，而是认为在凯恩斯学说的框架下，即使意见相左也应采取商榷的姿态。具有影响力的经济记者塞缪尔·布里坦1964年在其专栏摘要中评述道：“以凯恩斯勋爵的经济学说为基础，产生了计划和自由的有趣组合。”¹⁷ 1957年至1963年时任保守党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早已是凯恩斯的拥趸，并以此为荣，这一点倒与他的另一个角色完美契合：麦克米伦是凯恩斯作品的出版商，而《通论》则是麦克米伦的摇钱树。

在美国，1960年约翰·F.肯尼迪的当选得以检验这位新任总统23年前在哈佛大学大一修习经济学时学到的知识。就在他入学的前一年，《通论》传到了美国。阿瑟·施莱辛格，作为肯尼迪总统任期历史的作者，为自己哈佛人的身份自豪不已，他声称肯尼迪总统“无疑

是第一位信奉凯恩斯学说的总统”。¹⁸当然，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赫勒也是凯恩斯模式的遵循者。1962年年底，总统在成功为减税方案辩护之后说：“我给他们纯粹的凯恩斯和赫勒，他们看来很喜欢。”¹⁹对此，沃尔特·赫勒颇为自豪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即便如此，还要争取更多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时代虽然对美国基础建设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但还是不乏平衡预算的舆论和对政府开支的惯常谴责。而民主党前后言行不一，尤其是在越战造成生命和财富的流失之后，一方面实行战时经济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又否认战争的代价。尽管如此，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繁荣还是选择凯恩斯做它的守护神，这样做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只有入土为安，才能封为圣徒。或者，可能如《通论》最后几页提到的观念，而因为时间的错位，这些观念在作者死后才得以印证。其中著名的主张——我们不知不觉成为“已故的经济学家或学院文人的奴隶”——或者也可以这样解释：“我们在25岁或30岁之后就很难受到新理论的影响”，因此，当新观念成为主流的时候，“也就不可能是最新的观念了”。²⁰

1965年年末，《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给出了一句脍炙人口的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封面故事鲜明而亲切地使读者确信观念具有强大的力量，除了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主宰这个世界，正如凯恩斯30年前所提出的主张那样。“现在，凯恩斯以及他的观念已经获得广泛认同，尽管它还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却已经成为高等学府中新的正统学说、华盛顿经济管理的试金石。”不仅是经济顾问委员会赫勒的继任者如是说，就连1964年竞选失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的经济顾问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而这位经

济顾问并非他人，他正是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美国国内居领导地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而那个“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²¹的标题句也正出自他口。

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何人之口还有待查询——宛如流浪的迷失之犬，只要有人伸出手来便会上前示好。弗里德曼并不急于声称此话出自他口，相反，他给这句显然是即席的评论作出了注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人们已不再是凯恩斯主义者。”²²于是，这只孤独的猎犬在找到主人之前还要继续几年没有归属的日子，到那时它的狗牌才能刻上恰当而难忘的名字。

因此，当共和党总统不得不扮演这个分派给他的角色时，凯恩斯的政治影响力也达到了顶峰。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几年后，为了应对持续上升的失业率，着手拟定1971—1972年度预算，试图通过预算赤字刺激美国经济。尼克松将其想法公之于众，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演播室里，总统接受访谈后向一位评论员表示，“现在，我在经济上是个凯恩斯主义者”。²³尽管尼克松在政治上向来不以善于言辞著称，但却因这句话被误认为是“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原创者，这句话也成为—个时代的标志。

* * *

傲慢之言一出，一切便一目了然。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表明，经济的困难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凯恩斯主义在充分就业的状况下，是否是真正神奇的百宝箱，为经济的运行提供保障。凯恩斯死后，与他